

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埃及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刘 辉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英国对埃及30年的殖民占领是埃及民族陷入水深火热的殖民统治中,但是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双重使命”,埃及民主化的艰难启动与英国不免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众多民族国家独立,形成地区民主浪潮,对埃及的民主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埃及的民族资本短暂繁荣而英国暗弱,埃及抓住有利时机赢得有条件的独立;民族矛盾触发民主革命,完成独立使命的同时,民主化取得突破,奠定了1952年前宪政结构。

〔关键词〕一战;埃及;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149(2012)04-0001-03

埃及在19世纪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民主化进程坎坷而又曲折。源于日渐加深的西方入侵,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埃及的民主化在19世纪中晚期启动。埃及的内阁制与西方有直接的关系,但西方大国的干预却构成埃及这一时期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14年8月时,一战又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一战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冲击了原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创造了有利于埃及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环境。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¹,大国强权构成中东地区民主化的极大障碍,但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人的意愿发展。

战前,殖民统治削弱了奥斯曼和埃及内部的封建势力,埃及出现有了利于民主化发展的新变化。大战一举切断了埃及与奥斯曼土耳其宗主关系,进一步摧毁了束缚埃及民主化的封建桎。埃及自1517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以来,直至一战,这期间一直是它的东方行省。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东方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埃及在法律上仍然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地。“二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埃及的民族民主力量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尚不足以战胜来自奥斯曼、埃及上层的封建主义以及来自英法的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力量。“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与政治紧密相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埃及政治形势的新转折”^④。

土耳其加入德奥集团参战,英法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战场上的分外眼红的仇敌。早就图谋瓜分“西亚病夫”的英国趁机宣布“埃及今后处于英王陛下的保护之下”,中断了与奥斯曼的宗主关系。侯赛因·卡米勒上台后,不再称“赫底威”(意即伟大的埃米尔),改称“素丹”,他也是“自1517年以来土耳其人征服埃及以来第一个非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埃及统治者”,“埃及政府亦随之中断了与土耳其的联系”^④。奥斯曼战败,帝国彻底解体。在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中,土耳其共和国放弃了埃及。

一战的爆发打破了中东地区原有的政治力量的平衡,埃及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欧洲,英法大大削弱,传统封建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复存在,波兰复国,捷克、南斯拉夫等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得以建立,欧洲封建秩序的遗存遭到彻底摧毁。新的地区政治体系得以构建,土耳其人民奋勇抗争,创立共和国;阿富汗人民击败英军,终赢独立;伊朗起义风起云涌,北部出现苏维埃民主政权。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极大冲击了旧式的封建和殖民统治秩序。同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强调的一切附属民族自决权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发表,也进一步鼓励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1/4},外部环境的可喜变化都是进一步推动埃及构建民主国家的积极因素。

战争也使反映国家实力对比的天平朝着有利于埃及的方向倾斜。埃及是英国在中东前线的重要的战场和军事仆

*〔作者简介〕刘辉,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给基地,在英国对奥斯曼的战争中变得举足轻重。英国出于种种考虑,曾四次作出战后允许埃及独立的许诺。早在1914年11月英国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的同时,就曾声明战后给予埃及独立。埃及的民族独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旧有的地区秩序被打破,必须有新的政治形式与之匹配,即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相互尊重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尊重弱小民族的利益;根据国际法采用协商的形式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国家内部采用民主政体,各阶层自由平等,激励人民捍卫新兴民族国家。这种国际新的政治秩序有利于广大战后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发展。

其次,大战期间,埃及的发展和英国的相对衰落。

一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地球早已被国际市场和进出口贸易联系成有机的政体。战争既给欧战各国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又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机遇。大战期间,埃及的经济发展环境大为改善,竞争压力大大缓解。英国忙于战争,海上交通线阻塞,对埃及的商品输出大幅减少,确实起到了“近似关税保护的作用”。受利润驱动,爱国心的刺激,实业报国理想,民族资本掀起工商业高潮。短短几年内,工业规模取得了突破进展。1917年埃及组建了的埃及全国纺织公司,当年即加工原棉达五万担,生产棉纱三百五十万磅和棉布八百万至九百万码,产量比战前增长了15%—20%。此外,日用品轻工业和手工业日益繁荣,出口增长很快,由1914年的二千四百万零九万二千磅增加到1917年的四千一百零六万一千磅。 $\frac{1}{2}$ 四年间,贸易顺差约二千四百二十六万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埃及民族工业由初创到成熟的过渡的关键时期。民主化无法绕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对社会进步、国民素质、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民主观念的提高起决定性的作用。

“民主首先是内部发展的产物”,经济的发展变化预示着民主化的曙光,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埃及的新兴的民主力量,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羽翼日渐丰满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联合起来。1916年3月,成立了全国性的贸易和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许多反映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如发放贷款,成立工业发展银行,等等。大战期间,埃及增加10万工人,“到1917年,工人总数已达64万人”^④。大战结束时,全埃及已有90多个工会。^⑤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在埃及广泛播,引发深刻的社会反响。殖民统治打断了非洲部族政治和参议制的自然发展,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兴的公民社会缓慢发展,重建从大众心理、政治文化到制度层面的能够有效传达政情民意的民主体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民主成为协调现代社会中各种利益的有效手段之一。若要满足经济发展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和战后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需要,就要借助民主化扩大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进步,反过来促进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大战是帝国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客观上加速了英国的衰落。早在19世纪末,英国工业产量就被美国、德国先后超过。英军在战争中死74.7万人,伤169.3万人^⑥。直到1929年,英国的工业产量才勉强达到1913年的水平。实力决定国际关系,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政治层面。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无力阻止自治领的分离,无力镇压日益高涨的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被迫允许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些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有条件的独立。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矛盾及其尖锐,一触即发,一战无可避免地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⑦。

再次,战后,积蓄已久的英埃矛盾终于引发民族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既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独立,直接带进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

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必须注意到它的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孤立地看待它必然走向片面,必须力图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历史进程。“日不落帝国”参战意味着把整个大英帝国都卷入战争,埃及无可避免地被绑在英国的战车上,拖到协约国一方,给埃及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民主和专制统治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战争期间,英国不断强化统治机器,毫无民主可言。1914年11月1日实施军事管制法,六天后,通知埃及政府“埃及政府的政策现在要由英国军事当局监督和控制”^⑧,埃及立法会议无限期推迟,游行集会禁止,“违者轻则判处6个月的徒刑与20埃镑的罚金,重则判处两年有期徒刑。”^⑨11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旗帜报》、《杰里丹报》相继被查封,又解散了原埃及陆海军。“埃及处在英国的军事专制统治之下”。

现代战争对战略物资依赖性极大,战争打得就是物质财富,迫使殖民当局加紧搜刮,恶化了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条件,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主要矛盾。殖民当局推行单一作物,强迫农民种植棉花,压低价格收购价格,竟比国际市场价格低三倍,正常出口又受战争影响。据估计,“战争头两年,埃及在棉花生意中损失了2000万磅”,而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批发价格指数从1913年的100增长到1918年的211。土地兼并严重,“在埃及占有不足1费单土地的农民1910年为72万人,1916年超过100万人”,农民破产急剧增加。四年战争中,埃及工人的工资被压得极低,劳动条件低劣,工作时间极长,达十二至十五小时,仍不足以糊口。战后一些与军需有关的工厂关闭或破产,又造成一部分工人失业。此时的埃及,可谓民不聊生,潜伏着一场革命。

大战甫一结束,陷入经济衰退的英国为摆脱经济困境,立即加强向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倾销商品。埃及的关税自主权操纵在英国手中,极低的税率根本不能保障本国工业的发展。埃及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埃及的工厂、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工人失业急剧增长,英埃矛盾迅速激化。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短暂的繁荣虽使埃及的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但是埃及经济在战后迅速凋落,证明依附性的经济难以摆脱“萧条——发展——高峰——衰落”的窠臼,

唯一出路在于赢得独立。

埃及人充当马前卒,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加剧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在“志愿支前”的名义下,殖民当局先后征调了250万埃及劳工,前往中东战场与法国战场修筑工事,甚至与同盟国作战。在300万成年男子中,就有50万人被作“劳工团”和“骆驼队”,死伤成千上万。在战一期间英国的剥削压榨政策激化了埃及国内的各种矛盾,各种矛盾的矛头指向英国和英埃当局,摆脱殖民“保护”呼声日益高涨。埃及的问题深刻地体现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时空上往往具有一致性,互相交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主义与民主化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民族主义用鲜血催生民主政权,民主政权则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平等,更符合大众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压抑已久的埃及人再也无法忍受英国的军事占领,1918年11月13日,即德国签字投降的第三天,埃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柴鲁尔组织了一个埃及人的代表团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英军完全撤离埃及”、“埃及独立”的要求,并准备组织代表团到伦敦同英国政府谈判,到巴黎和会去申诉英国暴政。柴鲁尔明确提出,“用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英国殖民当局自食其言,凡尔赛和约第147条确认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美国则承认“英王陛下政府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布对埃及的保护”,完全抛弃了“居住在土耳其的各族人民有权自治”的原则。

在1919年的三月革命中,英国的殖民统治陷于瘫痪。拉什迪内阁与英国因承认柴鲁尔为埃及代表发生矛盾而垮台后,在没有内阁的条件下,由英国直接统治了一个月。无可奈何花落去,1922年3月16日,英国宣布埃及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实际上是有“保留”地承认了埃及的独立。

历时三年多的华夫脱运动终于有了结果。1923年4月19日颁布的宪法规定埃及为君主立宪政体的独立国家,这是“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现代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埃及为“君主立宪政体”的“独立国家”,素丹改称国王;确立了“主权在民”、“公民享受自由平等”等原则;议会为两院制,上院议员为122人,任期10年,下院议员为235人,任期5年。在1924年举行的首届埃及国会选举中,华夫脱党赢得了90%的选票,柴鲁尔受命组建第一届责任内阁。柴鲁尔执政期间致力于建立民族化政府、发展教育。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部宪法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如“宪法规定国王有解散国会、颁布法律、任命内阁之权”,“务必每年有一千五百英镑以上收入的人才有被选举权”等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战前“英国的智慧”支配“埃及的手”,埃及的民主化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应该看到,这些不足是

埃及的民主主义者和保守势力以及英帝国主义相互博弈、相互让步的结果,民主化进程长远来看无法阻挡。为取消这些不平等条款,埃及的民主主义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如华夫脱党执政期间,颁布了直接选举法代替两级选举法,等等。

英国对埃及30年的殖民占领是埃及民族陷入水深火热的殖民统治中,但是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双重使命”,埃及民主化的艰难启动与英国不免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众多民族国家独立,形成地区民主浪潮,对埃及的民主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埃及的民族资本短暂繁荣而英国暗弱,埃及抓住有利时机赢得有条件的独立;民族矛盾触发民主革命,完成独立使命的同时,民主化取得突破,奠定了1952年前宪政结构。

综上所述,考察埃及民主化的启动与发展,绕过和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是无法诠释清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当时政治经济矛盾激化的产物,又引发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如同毛泽东所言“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1],战后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与之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历史的纵向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杨灏城著. 埃及近代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35, 293.
- [2] 毕健康.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 雷钰, 苏瑞林著. 北京:《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43, 244, 245, 279.
- [4] 杨人著. 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23.
- [5]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79.
- [6] 朱亭光. 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627.
- [7] 列宁.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M].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03.
- [8] 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238.
- [9]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43. 279.
- [1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628.
- [11] 萨那, 孙成木, 于定辉等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责任校对 包金山〕